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東方出版社

德品公社製

王庆祥 萧文立 校注 罗继祖 审订

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昭军

装帧设计:尹凤阁

监 制: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王庆祥 萧文立校注 罗继祖审订

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7

ISBN 7-5060-1316-9

I. 罗…

II. ①王… ②萧… ③罗… ④长…

III. 社会科学-书信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1131 号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LUO ZHENYU WANG GUOWEI WANGLAI SHUXIN

王庆祥 萧文立校注 罗继祖审订

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3.375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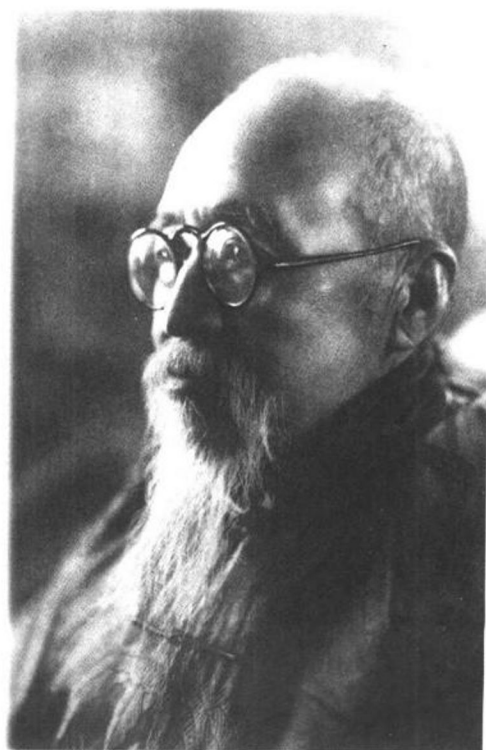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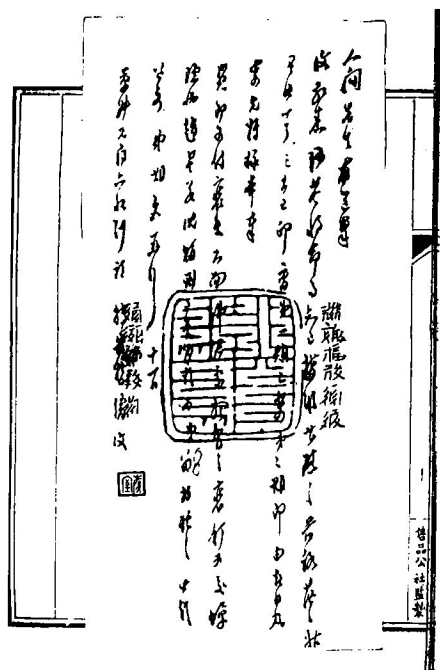
字数:606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5060-1316-9/K·271 定价:48.00 元



1916年春王国维返沪前，罗振玉(时年51岁)与王国维(时年40岁)
合影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永慕园

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



罗振玉晚年肖像(摄于1935年,时年70岁)

五十三年只欠一死任此世變義無再辱
 我死後當仲之銘即行棄葬於清寧堂北四
 等石後南歸亦多轉折概而居任任死而不
 義喪國遺孤不道匪人所骨水門胡也書籍少
 託陳美之先生處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
 南歸我雖至財產分文遺孤等然為謹慎
 勤儉亦不至餓死也

身自初方安字

王國維遺書(寫于1927年6月1日)



1937年羅振玉全家合影于旅順扶桑町寓居東樓正廳。羅氏時年72歲。後排右二為羅繼祖(長孫)、右三為羅福成(長子)、右四為羅曼華(王國維兒媳)、左一為羅福頤(五子)、左二為羅福葆(四子)。中排坐者為羅振玉及其繼配丁大年，左二為陳文珍(羅繼祖夫人)

义重如山

——以我近年经历的四件实事谈 我和人民政协的关系

罗 继 祖

记得人民政协成立 40 年、45 周年纪念，我都写过贺词，现在不觉又过了 2 年，岁月不居，人渐臻老耄，回首与政协相关的历历往事，我情不自禁，信笔所之，复成此文。

解放后，我没想到竟和长春市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 1955 年从大连市图书馆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开始的。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师，平日规规矩矩，不逞才，不使气，更不拿架子，埋身百僚底。那时研究马列主义，讲阶级斗争，我刚刚发蒙，勉强走上讲台。谁知我经过十年浩劫中的“劳改”后被认为有“一技之长”。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我又被任为长春市政协委员，当时还是无党派，不久加入九三学社成为民主人士。说来很惭愧，我在解放初期没有一点儿革命劳绩可言。

市政协历届领导对我屡加垂青，既操心我的生活，又畀我以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重任。1988 年离休转地大连，长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每出一期必寄我过目，我也偶有所作，一直联系未断。特别自原建新同志主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以来，又有四件实事必须特笔。

一、1991 年政协为了庆祝中共建党 70 周年，组织了本市一批民主人士，为之各写传记，以志与党一德同心的盛事，名为《胜友懿范各千秋》。这里竟有鄙人一份，执笔人又适为王庆祥同志，庆祥当时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名

义上是我的学生,但其入学后我正调去北京中华书局搞二十四史校点工作,整整三年,返校后,庆祥又做了我“四人帮”肆虐时期的难友,相识苦晚,因此我们仍是师生关系。他写好我的传略,寄给我过目,就是那篇《没有进过小学的大学教授》。我看后觉得正如自己胸中所欲言,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

二、1993年我年登八旬,蒙长春、大连两地机关友好及门下诸子念旧情殷,醺金称祝,有人竟远道莅临,为嫖面增辉,使我逊谢不遑。他们又提议由门下诸子及平日较亲密的朋友写回忆录得若干篇,汇成一集,我很怕大家把我虚恭维一通,不切实际,乃托王同策和王庆祥先看一遍。同策现为吉林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曾是我的助手。嗣后我也曾审改部分篇章。最后由同策、庆祥以及我的另外两名学生陈恩林(现为吉林大学教授兼古籍研究所所长)、陈维礼(现为吉林大学副教授)统编全书,写了前言,并将我自著的《涉世琐记》、《我七十年的思想变迁》、《两启轩咏史诗》和《两启轩主人自述简谱》等四种在内,统署曰《海角濡樽集》。剡劂之资,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古籍所、东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学刊三单位及21位个人众擎共举,不费我一文钱,而大数则长春市政协慨然任之,事乃克举。同时以八十诞辰由单位为编刊《祝寿集》的,还有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王钟翰和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屈守元两位教授,他俩的学术贡献都比我大,不同的是,其《祝寿集》内容出于学生笔下的居少数,而《海角濡樽集》中祝寿文章的作者则十之七八是学生,说明我和学生的关系还比较好,桑榆晚景,聊堪引慰。

三、我祖父雪堂公(罗振玉)和观堂(王国维)是一对儿肩负我国部分文化使命的人,他们在生平最关键的十多年中两地通信,中间虽有焚毁或佚失的,但仍积存不少书札。王氏书札这些年来经有心人辛苦搜辑,已大半刊出,成《王国维书信集》(中华书局版),罗氏书札尚无披露,因书札多分散在外,搜集实属不易,我频年留心所辑的《雪堂剩墨》中也以《家书》数十通为最难得,但值出版界

不景气，惟积稿压箱，难得问世。近年从台湾观堂后人得到信息，方知王家所存祖父雪堂公书札，仅有一小部分被火毁去，而大部分已入藏北京图书馆。经过几度联系，该馆终饷以复制本，而资料费也全由市政协慨任，真是义重如山，叫我不知所谢了。政协领导非常重视此项书札，意欲与往来对应的王国维书札汇印在一起，使成为完璧（王札虽有专书但未完整）。祖父的书札写得不如王札工整，当年陈太傅韬庵（陈宝琛）就说过不大认识祖父的字，我因经常看，一般能认识。惟两眼患白内障已十多年，目力衰退，辨字很费劲，如再一边辨认一边抄录，双管齐下，更支持不了，又无人可代替，而这批书札政协嘱望甚殷，已列入工作计划，我却病体如此，很觉得对不起。

四、我自1996年上半年白内障眼疾加重，无药可疗，因之前项工作不获进行，但庆祥已将书札全部取到，一看巍然巨帙，字小如蚁，看来费劲，一难也；字属草体，二难也；笺用自制博古笺，面有花纹，如字正在纹上，更不易辨，三难也。经此三难，竭庆祥、素娥伉俪与萧文立三人之力，将它辨识誊录并打印一过，到今年四月用我新动过手术效果良好的双眼复加校核，举正若干字，才堪为定稿，但还有不能辨识之字，只好用口口代替，或注明中缺若干字。大概两人通函时间从辛亥革命流亡日本起到民国十五年丙寅止绵亘十四五年一直未断，雪堂公时已年垂六十，尚能作此细字，意到笔随，可见精力弥满，敏捷过人，其中包括近代史料极多，可作个人日记观，而长春市政协决定尽早付梓，以飨当世。

说完切身相关的四件实事，我不免又要谈及已走过45年历程的国家和民族。一切新国家，都只能在破坏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我国建国初期17年来的经历，曾经叫我非常高兴，如“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等口号令人振奋，我家没等到解放，已把大公馆的架子收拾起来，男女仆人一概不用。那时的要求是“五爱”：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每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大家省吃俭用，“不作无益害有益”（把祝寿送礼讲人情都统

统包括在内),这些虽不全是口号,却是我所心向往之的。不过当年敌情观念比较重,也确有那么一小部分人企图复辟,搞垮新国家,而新国家为了战而胜之,采取极“左”政策,于是“肃反”、“反右”应运而生,一直演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才停止,已经耗费了可贵的若干年光阴了。这些话,痛定思痛,我不忍再多说。

新国家穷则思变,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全变好,加之中遭阨阻,这是非常的不幸。现在经济新有了机制变化,应该说要求全民富足,舍此别无他途,但尚苦不能适应。有些人见利忘义,以致出现种种怪现象,我们只好见怪不怪。赖当轴英明,颁布条法,力遏狂澜。一言以蔽之,症结在于对中西文化的科学因素没有明澈的认识和安排,又国民的自觉性不高,这里各有远近因。

我深信科学界先辈竺可桢先生的话,他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随时随地来变换,但科学的精神永远不能变,他在文中引了许多中西哲人的话,还引了《论语》多条。这些论点和健在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的言论也完全合辙。使我这个寡学肤闻的区区深信不疑。我国是东方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古国,过去保守和抗拒的弊病都消失了,所以他们得出“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极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强国”的结论。愿天佑吾华,奇绩肇现。

我挽仰一生,七八十年过去了。自 1988 年离休以来,检点身心,尚无愧怍。1996 年乘吉林大学过 50 年校庆之际,我也写了一篇《我的学术思想形成的前前后后》,作为我治学的“破而能立”的总结,一共写出七点:尊儒尊孔,反封反殖,良史直笔,略古详今,悲天悯人,同情弱者,针砭世风。我将终身以之,发挥一个离休干部的余热。

1997 年 5 月 4 日

写于大连湾之新三不斋

情深谊长

——罗继祖教授与长春市政协 的文史资料工作

原 建 新

知道罗继祖先生的名字是 20 多年前在吉林大学读书的时候。但那时只是闻其名,并未谋其面。1985 年我到长春市政协做文史资料工作,才有幸认识先生。

记得我到政协参与文史资料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校对罗先生撰写的《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书稿,通读书稿清样,使我对先生的经历、学问、人品以及罗家有所了解,知道先生曾任职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与政协交往甚密。先生能把这样重要的著作交给地方政协作为文史资料刊载,是对政协工作的极大支持。

后来,在政协的会议上见过罗先生,却未获机会接谈。再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有几次随同沙中典和孟令乙两位老领导,到先生家商量《庭闻忆略》的正式出版以及先生定居大连等事宜。初见名人,总有局促不安之感。但由于罗先生的随和,罗师母的爽朗,几次见面之后,就无拘无束了。此时的“罗宅”,仅有一小间卧室和一小间书房兼客厅。客厅内也无任何装饰,除墙壁上悬挂着“两启轩”的室名匾额及一张山水画外,就是一个普通书桌、一排老式旧书架、一张单人木板床和两三把硬木椅。书桌、书架和床上都堆满了书。先生中等个头,但身体纤弱,或因双耳失聪,而少言寡语。与先生交流多半要以纸笔代言。我却得以在这种特殊方式的交流中,欣赏先生清秀的书法和凝练的文字,从中大获教益。

1988年罗先生定居大连。从此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但与先生鸿雁往来,从未间断。愧疚的是,多半是先生来函,我的复信反而较少。特别让我感动的是罗先生两次亲书条幅托人带给我,1998年4月给我的条幅中书:“神女有情行暮雨,东坡知己只朝云。”字迹秀雅,蕴涵丰富。

《长春文史资料》我每期都送罗先生,而先生收到必复函。当今社会人们多于恭维,然而先生却能实事求是、坦诚直言,对挚友、熟人更是如此。先生多次评述《长春文史资料》,有鼓励,也有批评,有爱护,更有教诲,其真诚是罕见的,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

最大的帮助,是罗先生能以著名文史学家的身份,亲自撰写文史资料。1982年《长春文史资料》创刊以来,先生已为我们撰写了《康德印书馆》、《京都杂忆》、《庭闻忆略》、《溥仪居津轶话》、《读〈黑衣宰相郑孝胥〉补漏》、《涉世琐记》、《我七十年来的思想变迁》、《两启轩咏史诗》、《两启轩主人自述简谱》、《不怕洋人——〈左宗棠传〉读后》等多篇文稿和评论文章,以洋洋数十万言为《长春文史资料》增色。

1992年《长春文史资料》创刊10周年之际,罗先生写了《〈长春文史资料〉创刊10周年贺词》一文,讲述在“文革”中有人误认为他是政协委员,直到1978年他才真的成为政协委员并担任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的过程。先生写道:“1978年冬,我真正当上了长春市政协委员,是以‘无党派人士’名义参加的,我很高兴。之后我又被安排为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蒙党不弃,与愿已足,下一步就是尽自己的血忱图报了。”《贺词》还述及若干与长春市政协“关系颇深厚”的事例,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如下中肯的评论:“我看到的每期《长春文史资料》……除去有些材料不为我所措意,其中有的,我认为是精金美玉、耐人玩索。”“几期《长春文史资料》里,虽然也夹杂一点附庸风雅、趣味低俗的,但总的说,都有关于日伪和长春的故事,可备异日志乘之甄采……”“我是学史的,一贯不会说假话,几无一字不自肺腑中出,想政协诸君均能谅鉴也。”先生

为人处世从无虚言，可谓肝胆相照、耿耿诤友。1994 年先生又撰文，为人民政协成立 45 周年致贺，坦露了他对中国特色的这一民主政治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的一片关爱和无限深情。

1992 年冬，《长春文史资料》动议编辑知名人士的日记资料，特别是建国后的日记史料。我们顶风冒雪登门求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征集到我国著名化学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创建人吴学周先生的 130 余册、1000 多万字的全部日记，以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的部分日记，从而在征集建国后“三亲”史料方面，有了新的尝试和突破。谈到这项成果，也是与罗先生的义举分不开的。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我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先生寓所，见到罗先生在“文革”期间的日记，标名《劳改日记》和《劳动反省日记》，共 5 小本，约十万余字。记录了罗先生自 1966 年 9 月至 1968 年底的一些经历和感想，虽然都是在强制条件下写出的，却也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其内容有“触及皮肉的劳动改造”，有“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有“学习最高指示不过夜的欢呼”，有“知识分子的上山下乡”，也有对政治斗争中的形式主义、对戴高帽挂牌批斗、对揭发问题不实事求是等表示不理解等等。有趣的是其中还有“监督小组”和“工宣队”的审读批语，以红笔“批示”，多数是“阅”、“看过”、“不深刻”、“这样日记是应付，要认真写出思想”云云。其中还有这样两条“批示”最富“价值”一段写道：“不许你用此文为你被斗翻案，我们革命者说‘好得很’，你们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另一段写道：“你如愿降低工资，就把捐献部分交到‘系文革’处理（通过监督小组）。这里没有一点强迫，全由你自愿。”

这些珍贵的日记怎么会落到王先生手中呢？王先生说：“罗老的气度是少见的，为人做事痛快，尤其淡泊名利。他这几本日记，是作为历史纪念品送给我的，因为我不但是他几十年来最关爱的学生之一，也是当年与他同住‘牛棚’的极少数几个学生中间的一个，是同屋檐下的难友，最能理解这些日记的价值。罗先生就送

给我了。如果你们觉得日记可用,就请在《长春文史资料》上发表,罗老肯定会支持的。”嗣后,我们就发表这些日记,当面向罗先生请教,得到先生的慨然允诺。征集建国后的史料有它自身的难度,征集建国后的日记史料更见其难。是罗先生这些宝贵的日记启发了我们,使我们产生了征集名人日记的想法,并鼓励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去做好这项工作。

现在,长达十余万字的罗先生《“文革”日记》,已在《长春文史资料》(总第57辑)上发表了。先生收读后给我来信说:“拙撰日记竟被采登,实甚欣幸。当时迫不获己,今天再看,所言并非尽属违心之言,也有心中所欲言而藉以发泄者,故有一刊之价值。据近日所见,计已有巴金之《随想录》、季羨林之《牛棚杂忆》、朱东润之自传与不佞此编,共得四种,可成一系。不过他们都是‘大老虎’,我则‘小老虎’耳,若论文笔,亦差可雁行。”

1993年末,罗先生宏大的气度和诚挚的品格再次给我们以鼓励。王国维、罗振玉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文化史上影响广泛的一代宗师,他们的学术事业、社会活动和往来关系,最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们共处的那个时代的某些特点,具有深入研究的巨大价值。因此,当我们从王庆祥先生处得知罗振玉致王国维的许多书札存藏于北京图书馆(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又有王国维致罗振玉的大量信函保存于罗先生家时,就萌生了整理罗、王往来书信的想法。此意一经提出,即得到罗先生的支持。先生当即致函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商得同意,由长春市政协拨付经费,取得全部罗振玉信函照相还原件700余札。继而先生又把自家珍藏,以及旅顺博物馆等单位存藏的王国维书札提供出来。合两人书札,总计近千通。正是罗先生的支持,使我们有幸得以奠定整理罗、王往来书信的资料基础,使我们大胆的设想得以落实。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记录了两人自本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的笔墨神交,绝大部分不曾披露。其内容涉及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观点以及在中国和日本参与的政治性活动,涉及他们撰写

的许多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涉及他们与中日两国上层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交往,涉及两位文化名人的生平大事,这些内容可以解决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文化史上的许多疑案,可以揭示那个历史时期的学术环境、研究水平和学人风气,其史料价值、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实在不可低估。罗、王书札的整理与问世,将是当代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一大贡献。

提供罗、王书札非罗先生无成,整理罗、王书札更离不开先生指导。这项工作自1994年做起,历时六载于1999年10月末定稿,其间为完成校注、审订、编辑等项任务,我们在先生指导下甘苦与共,不但实现了预期的计划,还向先生学到了许多知识,并在更高的程度上,理解了先生的治学方法及人格风范。

整理罗、王书札是一项集识辨、校勘、注释、考证、确定顺序、撰写按语等为一体的系统研究工程。拿识辨来说,就有极大的难度。正如雪堂先生自谓,其札行文好像“春蚓秋蛇”,“字如小蝇、形同龟殷”,极难辨认。面对这项课题,又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非毅力与能力不能完成。当其时也,偏偏赶上罗先生双耳失聪,更加之双目白内障加剧,几于失明,面对不甚清晰的照相还原件稿本,而欲逐字辨认,实在力不从心。然而,这项研究还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起步了。

1994年夏,王庆祥先生接受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委托专程赴大连,协助罗先生展开艰难的辨识工作,摸索经验,寻求规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大体上确立了深入研究的基本思路。因为王先生职在长春,而近千封书札的辨识工作,显然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师生两人决定,也请萧文立先生参与罗札的辨识工作。嗣后,由文立协助罗先生对书札初加辨识,再将初辨稿寄至长春,经王先生整理并输入电脑,打字稿还要寄回大连,则进入二次辨识程序,几年间往返数度,浩大工程,伟形渐显。文立常侍先生之侧,出力颇多。王先生也多次往来大连、长春之间,还曾专程前往北京图书馆,以辨识初稿与罗札原件相校核,使疑识之字渐归于

确识。

回想 1995 年罗先生因白内障加重双目弱视，书札整理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但无论是罗先生，还是庆祥与文立，都没有畏缩，仍是一心想着，让学术界能早日利用这一批宝贵的文献资料。每念及此，长春市政协的领导同志，都由衷地对三位学者的辛勤劳动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并表示最诚挚地感谢。1996 年初夏，我出差到大连，原想必往罗先生府上拜访，却意外发生了颈椎骨折，我在大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卧床两个月，也就是这个时候，先生也进行了白内障摘除手术，我们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庆幸的是，我和先生都战胜了疾病：先生年过八旬，两次眼科手术都很成功，双目恢复了正常；我在半年后也得到康复，重返工作岗位。我深感先生的健康实在重要，先生的双眼明亮了，学术文化界多少双关注这部书札的眼睛也明亮了。

1997 年 3 月中旬，我们再度委托庆祥前往大连，与文立一起，在罗先生指导下全面展开罗、王书札的整理工作，除对已经辨识的书札稿本加以复核外，还要进行校注、审订和增写按语等工作，在此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位先生聚首切磋，共度了一个难忘的春天。我曾看到罗先生在庆祥将要离开连湾的前夕，欣然命笔给他写下的一帧条幅。上面是先生即兴吟就的一首五律：

旧雨联新雨，陶然共一樽。

白云望无尽，青史要重论。

魑魅白日匿，冰霜吾道存。

相与辨蛇虺，宿草录遗文。

罗先生还在这首诗后附录一段跋语：“历丁丑清明节，与庆祥、文立草堂小酌，共整理雪堂遗札，字草且小，极难辨识，札多至六七百通，以论学与纵谈时事为多，可作日记读。越旬日，为庆祥书之，兼送其行。八五老人鳊翁。”看到这张条幅，令我有身临其境之感：清明节那天，窗外细雨蒙蒙，先生与两位弟子在考辨书札的余暇，小酌论道，其乐融融。这无疑是一件为人乐道的学林韵事。

白驹过隙,时不我待,匆匆五载过去。1998年2月,我们第三次委托庆祥前往大连,向罗先生请教《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的后期工作,全书定稿阶段就此开始。其间,庆祥协助罗先生对书稿中疑难较多的信函一件件复审,以昭慎重。

庆祥返回长春后,又在大连工作的基础上,对文立初步编排的书札时序考核一过,统一了体例和文字,对札中涉及的金甲文与图形等,也做了相应的专业处理,并编制了“罗王书信中通用、假借、异体及误用字与目前规范用字对照表”附于书后,全书于1999年5月第一次定稿。作为老朋友,我对庆祥是很了解的,他的敬业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令我钦佩。作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溥仪生平의知名专家,他对罗振玉和王国维那个时代的背景与环境,以及两人作为清朝遗老的思想、感情和经历,都有更多的了解与理解。

任何一部内容重要的优秀书稿,都是千锤百炼的成果。根据政协领导的指示,我们把第一次定稿本再度寄交罗先生复审。又经历数月,罗先生提出了最后的审订意见,文立又逐字筛过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校改意见,最后由我和庆祥参考这些意见定稿,全书就此杀青。

整理罗、王书札,除了必须投入足够的经费外,还要有胆识、毅力,尤其需要学问。虽然我也是学文的,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政协文史部门任职多年,但自觉还是学问欠缺。正是罗先生渊博的学识基础,使这部书札的整理工作得以锦上添花。在此还应提到的,是先生在审订辨识札稿之际,附笔写下的一条条精绝的按语,对学界和后世必有极大的导引和启迪作用。

罗先生非但不居功,反而极力推崇我们的工作。1997年4月19日是先生85岁寿诞,此前,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致函祝贺并送寿山石佛雕一尊。先生在众多亲朋和弟子参加的祝寿活动中特别致辞说:“长春市政协不惜人力和财力来从事书札整理工作,固然这些书札有其历史价值,然而我也不能忘记他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这一份热心。我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地支持这项工作,